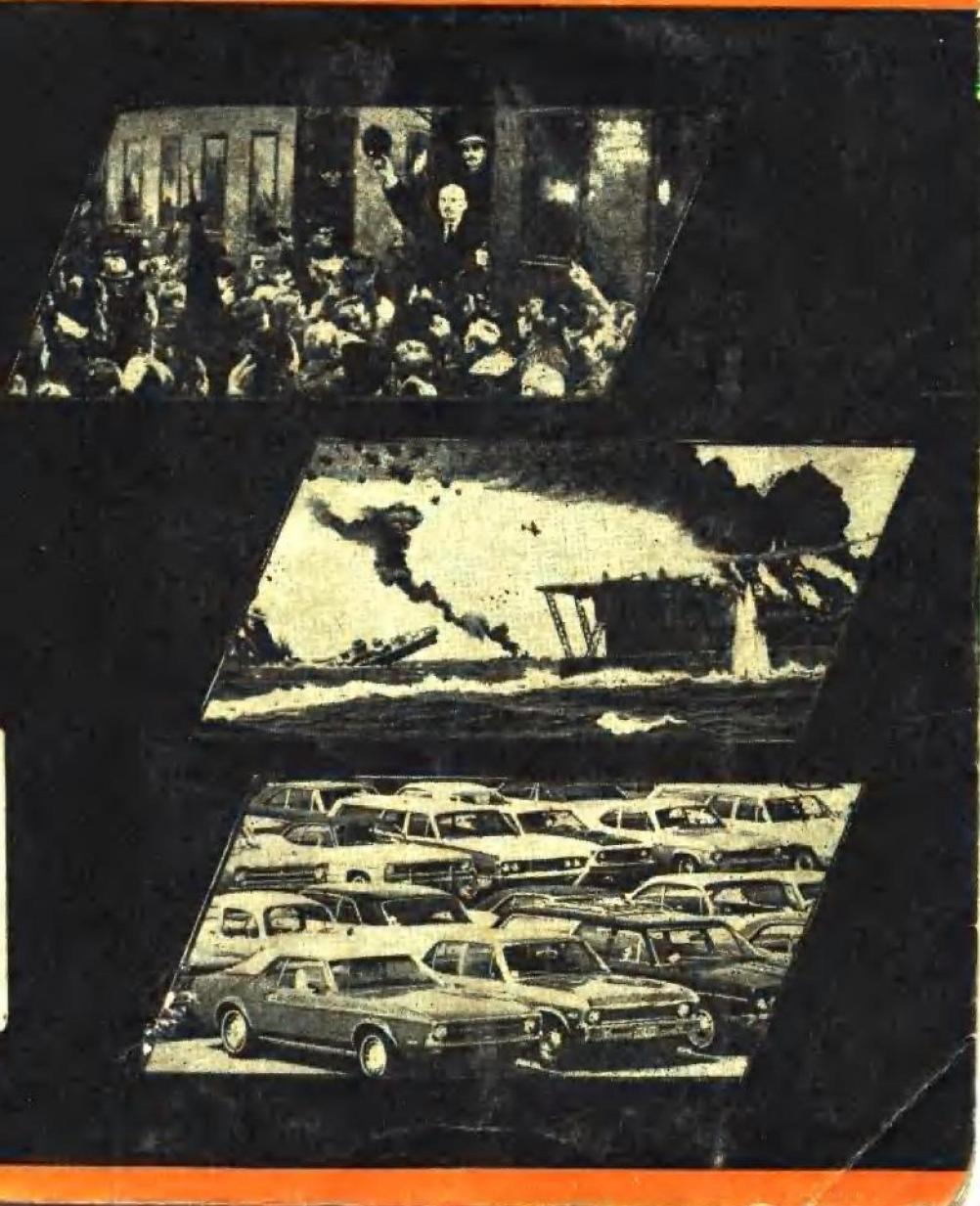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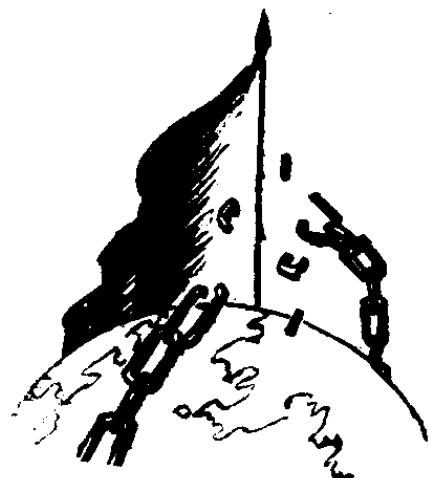
世界现代史论文集

中国世界现代
史研究会编



世界现代史论文集

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封面设计：王师颉

世界现代史论文集

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装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314,000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500

书号 11002·596 定价 1.35元

前　　言

1981年8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四川乐山举行。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近一百篇，我们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从中选择二十三篇，汇编成集。各篇论文的观点自然只是作者个人的看法，既不代表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也与出版单位无关。

文章有一部分已在其他刊物上先行发表，在收入本集时，均经作者作了修改。

世界现代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我们热切地希望同志们今后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进一步开展研究，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会

1981年12月



RD09117

目 录

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争取农民群众的斗争	北京大学 徐天新 (1)
列宁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北京师范大学 卢文璞 (15)
新经济政策与工农联盟	兰州大学 侯尚智 (33)
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	吉林大学 穆中魂 (54)
关于 1919 年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问题	南开大学 林和坤 (72)
试论 1919 年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	湖南师范学院 李茂梓 (81)
略论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法	北京外交学院 欧 亚 (99)
罗斯福的新殖民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金永华 (121)
北大西洋公约缔结前后美国与西欧的关系	复旦大学 阴巧云 (139)
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动因初探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武克全 (157)
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典型	暨南大学 周希奋 (172)
——试论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化的特点		
试论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关系的演变	复旦大学 伍贻康 (191)

论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	西北大学	彭树智	(207)
甘地评价再论	上海师范学院	吴成平	(232)
论加纳独立的性质	南开大学 张象	黄若迟	(248)

论 1917 年底至 1918 年初真假和平的斗争

.....	北京师范学院	齐世荣	(262)
论洛加诺公约的性质	北京师范学院	姜书元	(287)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经济战	天津师范学院	崔树菊	(302)
太平洋战争前的美日关系	人民出版社	邓蜀生	(317)
谁负珍珠港事件的责任?	武汉大学	张继平	(344)
纳粹德国的对英政策	华东师范大学 李巨廉 郑寅达		(361)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欧洲外交的历史教训	云南大学 吴继德	(376)
法西斯德国失败的经济因素	武汉大学 戴德铮		(396)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党争取 农民群众的斗争

北京大学 徐天新

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1913年，个体农民（不包括富农）和个体手工业者达到人口总数的 66.7%，而工人和农民只占 17%。^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量农民被征召参军。在俄国临时政府的 900 万军队中，大约 80% 是农民。^②无产阶级队伍中也增添了许多不久前才从农村来的庄稼汉。曾对 33 个省的 983,855 名工人进行过调查，其中 308,411 人，即 30% 以上的工人在农村有土地或自己的家庭在农村有土地。^③大战使千百万农民离开闭塞的农村，开始参与政治活动。这使小生产者的影响迅速扩大，到 1917 年初几乎吞没俄国的一切。因此，争取团结农民群众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十月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有过很多论述。但是，大多忽略了布尔什维克党争取团结中农的工作，回避了党争取联合农民政党的工作。本文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二月革命后的最初阶段，全俄几乎没有农民运动。绝大多数农民都跟着资产阶级走。3 月 29 日召开了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大会通过的决议完全支持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支持立宪会议解

决土地问题，并明确表示反对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之前采取任何擅自行动。全俄会议之后，各地苏维埃大多数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广大农民耐心地等待着临时政府和立宪会议的决定，相信通过合法途径会得到世代盼望的土地。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这种现象不会长久继续下去。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同地主有着密切联系和某种共同利害关系。地主土地有60%抵押在银行里。资本家不肯把这些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农民。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政府自然也不愿彻底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政府同农民的矛盾必将日益暴露，农民运动必将兴起。列宁早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就预见到这点，并十分重视农民斗争的发展。他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而把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④列宁不仅确信农民反地主运动将具有巨大规模，而且认为它将极大地推动革命斗争，把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在落后的俄国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争取团结广大农民群众，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农民战争”结合起来。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开展了争取全体劳动农民，包括中农的巨大工作。苏联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采取的不是团结中农，而是中立中农的政策。^⑤他们经常引用列宁的两段论述作为依据。一段是列宁在1905年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的论述：“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⑥另一段是四月提纲

中的话：“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⑦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列宁在二月革命前确曾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应麻痹中农，即中立中农的思想。可是，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期间列宁却从未明确提出要中立中农，他只是强调要同贫农结成联盟。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列宁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列宁一贯认为中农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它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私有者，它又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时刻，在争取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党很难立刻把中农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只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才可能同中农建成联盟。但是，列宁没有拘泥于这一思想。他十分注意局势发展的特点，看到俄国民主革命虽已取得胜利，但土地问题却没有解决，并且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他预计到农民同地主的矛盾，同维护地主所有制的临时政府的矛盾将是农村中最尖锐的问题。因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政权问题时，在农村可以先不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富农的革命，而是要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地主的斗争。这样，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完全有可能团结包括中农在内的全体劳动农民。列宁的这种看法不是彻底否定中立中农的思想，只是认为这一口号的贯彻在俄国可以不在无产阶级夺权之际，而在下一阶段，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准备期间没有采取中立中农政策的另一个可靠依据是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是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它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问题，而是把打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封建地主阶级。纲领规定“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⑧有些人认为，列宁指出的这几点同党在二月革命前的

土地纲领没有区别。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然提出过，但是，这两点现时是在新的基础上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虽是一项民主任务，但临时政府无力完成。因此，四月提纲提出的这项任务预计是由新型国家政权机关——苏维埃来完成的。没收来的土地也是由苏维埃来支配的。其次，土地国有化是农民的历来要求，他们希望通过铲除地界来消除土地制度中的混乱情况。这项要求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但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却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同时为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如列宁所说：“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顶峰’，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⑨临时政府对农民的这项要求视为非分，不予理睬。因此，这项任务也只有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才能实现。总之，四月提纲所规定的土地纲领同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不一样。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要求，它为政权转归苏维埃创造条件，它是党在过渡时期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土地纲领。

讲到土地纲领还必须谈一谈土地平均使用的问题。这项要求是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反映了个体农民的愿望。在根据 242 份农民委托书编写的示范委托书中也提到上述要求。土地平均使用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它既不能消除剥削，也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它同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是不一致的。但是，列宁在 9 月就决定接受这一要求，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把它写入土地法令之中。列宁说：在这方面“我们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作了许多让步”。^⑩这项决策表明，党是不惜作出某种让步来争取同中农达成协议的。

总之，从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从党在过渡时期的土地纲领都可以看出，党在农村争取团结的不仅有贫雇农，而且包括中农；无产阶级将团结全体劳动农民共同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布尔什维克党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斗争中，特别注意同农民政

党的关系。俄国民族主义政党大体可分为三派：最主要的是社会革命党，态度比它更右一些的是人民社会党，态度比较左一些但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大的是最高纲领派。他们都自称为农民的代表，经常诉说农民的疾苦。他们提出土地社会化纲领，要求没收地主土地，把土地排除出商品流通领域，使土地从个人的私有财富变成全民财产，认为土地应由社会自治机构按“消费定额”、“劳动定额”平分给农民。这种观点虽然有错误，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幻想成份，但对推动农民斗争起了积极作用。在民主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是革命民主派，作出过一定贡献。二月革命后，它的情况发生变化。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二月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全民革命。他们对二月革命十分满意，说“成果是足够的”，认为不必再进行革命，只要通过议会立法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是护国主义分子，主张同资产阶级合作。在土地问题上，继续坚持社会化纲领，但反对立即夺取地主土地，主张等待立宪会议解决。社会革命党的这些观点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看法和要求，因而它在二月革命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地方的全村大部分居民或全连的士兵都同时加入它的队伍。农村中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比较小。当时俄国除去被同盟国占领的地区外，大约还有 14,500 个乡。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7 年只有 203 个农村支部和 4,000 多名农村党员。它在农村中的影响远不如社会革命党。1917 年 5 月召开了全俄第一次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全是社会革命党人。可见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对待这样一个政党，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说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政党，^⑪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代表小业主、中小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⑫ 七月事

件之后，列宁仍称它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⑬还说，布尔什维克党对社会革命党采取了孤立政策。^⑭这种提法不够全面，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二月革命后，列宁曾设想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结成联盟以孤立资产阶级，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当然，也严肃批评了社会革命党的错误，指出他们向资产阶级妥协让步和制造对立宪会议的幻想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⑮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妥协政策的碰壁，社会革命党日益分化为三派。布尔什维克党对他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克伦斯基、马斯洛夫、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人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过去说资产阶级是反动的，说在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革命。二月革命后却主张同资产阶级联合，说“民主派”的任务不是排除资本主义，而是使“资本主义局限化，即把资本主义限制在它最大程度表现自己创造性，最小程度表现破坏性的经济活动领域。”^⑯他们完全倒向资产阶级，全面支持临时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他们从原有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倒退下来。担任农业部长的马斯洛夫在10月提出了新的土地法案，规定地主应交出的土地只限于休闲地和出租地；这些土地组成“临时出租土地”，由土地委员会管理；后者负责把这些土地出租给农民，负责把农民交来的租金在扣除官税支出后交给地主。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个建议实际是用微小让步来保存地主所有制的立宪民主党方案。布尔什维克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背叛农民的行径给予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明确提出“决不能同完全投到敌人营垒的人协商，决不能同他们结成联盟”。^⑰党的任务是使他们在农民中完全孤立起来。社会革命党中央中占多数的是切尔诺夫、郭茨等中派。他们也支持临时政府，但经常向政府提出要求，施加压力。8月社会革命党第七次扩大总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有可能就废除死刑，消除行政专横；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便在民主基础上缔结和约；立即颁布和实施土地法令，按党纲精神调整农

村土地关系。列宁十分注意中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临时政府的差别和矛盾。他指出：“切尔诺夫企图对地主立宪民主党人实行大大小小的让步来捍卫农民的利益，但是都遭到了破产，于是切尔诺夫退出了政府”。^⑯ 在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特殊情况下，在 9 月 8 日到 13 日的五天里，布尔什维克党还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结成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在斗争中，共同组成《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负责指挥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各武装力量。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社会革命党人费里波夫斯基。切尔诺夫还发表了《致全体农民书》，呼吁农民、士兵同土地改革的敌人斗争。^⑰ 列宁对同社会革命党的这次联盟给以高度评价。他说：“这个联盟当时最彻底地、比在以往任何一次革命中更轻易地战胜了反革命”。^⑱ 但是，中派脱离资产阶级只是短暂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同资产阶级一起，用空话来欺骗农民以维护临时政府的统治。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对中派社会革命党人，对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态度主要是揭发他们的背叛以争取广大农民脱离他们的影响，站到无产阶级一边。但也没有放弃同他们建立某种联盟的机会。斯皮里多诺娃、卡姆柯夫等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仍坚持原来的民粹主义纲领，否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主张建立“人民政权”、“纯粹的民主政权”。他们对资产阶级长期抱有幻想，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但他们对临时政府的各项政策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七月事件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主张政权转归苏维埃。在 9 月召开的预备议会上，左派称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路线是叛卖性的，并退出社会革命党党团会议。地方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行动更为坚决，大多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据古谢夫等人计算，到十月革命前夕，在 678 个县中左派社会革命党至少在 300 个县中有自己的独立组织。^⑲ 布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左派社会革命党，认为它的发展是革命“转变的客观标志”，^⑳ 号召左派尽早

从社会革命党中分裂出来。奥里明斯基发表文章说：“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是想用一些同我们要求相近的决议来欺骗工人，如果他们不想对工农的敌人有利，那么，他们首先应该……让党内所有的资产阶级分子见鬼去，或者自己从党内分裂出来”。^②由于种种原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前没有形成独立的党派，也没有停止过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仍一直争取团结它。布尔什维克在退出预备议会前曾同卡姆柯夫、纳坦松等人会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示要继续留在预备议会里，但答应“全力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会外的革命行动”。^③这种立场使布尔什维克认为有可能吸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大约在 10 月 25 日，列宁会见波德沃依斯基等人时，建议由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的代表共同组成军事革命委员会。^④虽然布尔什维克没能立即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正式同盟关系，但后者没拒绝参加起义。有 7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它的第一任主席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兹米尔。更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加了推翻临时政府的武装斗争。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对社会革命党采取简单的孤立政策。它只对那些完全倒向资产阶级一边的少数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对大多数动摇分子采取了批评和团结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党的这种区别对待的慎重态度，说明它十分重视同中小农民的关系，努力争取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以团结最广大的农民群众。

布尔什维克党推行的这种争取团结农民大众和农民政党的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了必不可少的革命队伍。二月革命后的初期，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众并没有跟着无产阶级走，他们相信临时政府，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农村中

最初几乎没有破坏法制的事件。3月15日以后，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强占土地的事情，但政府派人去解释说服，都还能平息事端。从4月起，农民运动迅速兴起。这时，春耕即将开始。租地条件，使用牧场森林的办法以及农具的来源等问题急待解决。而临时政府在3月17日的《就土地问题致民众书》中却只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空话，根本没有涉及具体问题。4月11日，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春播》的法令，以关心生产为名保护地主私有土地。农民对这项法令作了另一种解释。他们说，为了保障春播，凡是未耕种的地主土地，农民都有权夺取过来种上庄稼。农民的革命行动使临时政府感到恐慌。4月21日，政府宣布成立各级土地委员会。规定它的任务是了解农村的土地需求情况，向立宪会议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参考意见以及调解农村的各种纠纷。土地委员会的成立必须经上级审查批准，活动也要受上级监督。临时政府企图用这个办法来控制农民活动。但是，农民并不接受政府的控制。结果，三分之二的乡土地委员会被认为“不合手续”，政府不予承认，也不发给经费。临时政府的这些行径使它同广大农民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布尔什维克党抓住这些事例积极向农民进行宣传。它在1917年出版了11种杂志，30种报纸，每天发行量达32万份。党还派遣大量宣传员下乡宣传，组织工人和士兵回自己家乡工作。他们对农民宣传的重点不是说明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实质，而是揭露它的反农民本质。当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盛加略夫宣布：“不经全国法律的许可就擅自解决土地问题”是“越轨行动”，并要求农民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指出：真正的越轨行动是地主抓住土地不放，是地主根据历来的旧权利要求农民同他达成“自愿协议”。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是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他们不可能同地主达成什么“自愿协议”。临时政府提出的“自愿协议”实际是对农民土地要求的否定。布尔什维克党明确指出：临时政府的政

策同全体劳动农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只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才能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交给农民。

在开展宣传的同时，党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列宁提出要建立贫雇农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现实斗争中，贫雇农苏维埃比较少，而农民苏维埃到7月末已在52个省388个县中建立起来。^②直到1918年成立贫农委员会以前，农民苏维埃和其他按民主原则组成的农民组织（如乡土地委员会）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依靠的主要组织力量。在具体斗争策略上，党提出要立即有组织地夺取地主土地。列宁十分重视这一点。他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说：“我把土地国有化放在第三位，因为第一位的是主动精神和革命行动”。^③列宁这里提到的“主动精神和革命行动”不是指贫苦农民反对富农的斗争，而是说全体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革命主动。列宁把它放在第一位，不仅因为农民的革命行动是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保证，同时它也是对临时政府政策的直接否定，是促使广大农民消除对资产阶级信任，转向无产阶级的有力武器。

随着临时政府危机的加深和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加强，农民斗争日益兴起。3月份仅在34个县发生49次农民运动，4月份则在174个县发生216次，5月份在236个县发生259次，6月份在280个县发生577次。^④农民的斗争从分散的、少数人的行动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的行动。科斯特罗马县的土地委员会在6月初决定把潘宁纳娅伯爵夫人的土地交归乡土地委员会管理。后者把这些土地租给七个农民，并规定每俄亩土地的租金不再是以前的100—130卢布，而是5—20卢布。^⑤土地委员会和农民苏维埃也逐渐成为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农民斗争的形式日益激烈。从要求减低租金、自行收割地主的庄稼发展到夺取森林、牧场、农具和土地。斗争的锋芒主要针对了贵族地主。从3月到10月一共发生了5,782次农民运动，其中4,956次是指向地主的，占85.7%，

指向富农的仅有 362 次，占 6.3%。^⑩ 参加这场斗争的不仅有贫苦农民，而且有中农。

7 月临时政府向德奥集团发动进攻遭到失败后，士兵逐渐不信任临时政府，群众中的革命护国主义情绪也有很大消退。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加紧在农民中进行工作，以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7 月，临时政府发布命令，规定不得侵犯土地所有权，不得私自把牲口赶到别人土地上放牧，未经地主同意不得削减地租。并宣布，地方农民组织的决定如与此法令相抵触一律无效。为了贯彻这一法令，为了平息农民的反抗，临时政府经常动用军队。3 月到 6 月一共有 17 起武力镇压农民事件，7 月到 8 月就增加到 39 起，而 9 月到 10 月达到 105 起。^⑪ 临时政府还公然逮捕组织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乡土地委员会成员和农民苏维埃的代表。9 月，在临时政府的纵容下，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妄图建立军事专政，恢复旧秩序。布尔什维克党抓住这些事实反复向农民说明，依靠临时政府不仅不会得到土地，而且要遭到镇压，会出现地主统治的复辟。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农民的情绪发生根本变化。他们不再相信临时政府，开始转到无产阶级一边。他们不顾临时政府的武力镇压纷纷起来斗争，有的地方全乡农民联合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9 月 21 日，唐波夫省科兹洛夫县塞切夫卡村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烧毁地主庄园。县政府慌忙派军队去镇压，但士兵同情农民，有些人公开站到起义群众一边。省政府派去一个骑兵团也未能阻止事态扩大。全县农民都投入斗争，焚毁了 57 个地主庄园。最后，临时政府从莫斯科和其他地方调来士官生和哥萨克，逮捕了 1,500 多人才逐步平息了这一事件。但在其他地方，在欧俄的 26 个省中又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

列宁十分重视农民起义的出现。他认为农民起义是“俄国近来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⑫ 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中，发生农民